

【跟大师学国学】

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 新编

蒋廷黻 著



中华书局

〔跟大师学国学〕

中国近代史新编

蒋廷黻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新编/蒋廷黻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3
(跟大师学国学)
ISBN 978-7-101-11505-5

I.中… II.蒋… III.中国历史-近代史 IV.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4086号

-
- 书 名 中国近代史新编
著 者 蒋廷黻
丛 书 名 跟大师学国学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3月北京第1版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 $\frac{7}{8}$ 插页2 字数210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505-5
定 价 25.00元
-

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跟大师学国学”出版缘起

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

“国学”之名，始自清末。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号为“新学”、“西学”等，与之相对，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或“国学”等。

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人文学术勃兴，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著述，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其价值自不待言。

遗憾的是，出于诸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错漏杂见，有的久不再版，一书难觅。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出版“跟大师学国学”书系，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简明扼要的作品，仔细编校，统一装帧，分批推出，以飨读者。

这些作品，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另有一部分，出自当日名家，影响很大，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借此次机会，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

这些作品，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如张荫麟先生

《中国史纲》；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如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和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所写的通俗读物，如吕思勉先生《三国史话》——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不作高头讲章，也不掺杂教条习气。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

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界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

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朱自清先生说得好：“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

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9年4月

写在前面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自1935年怀着书生报国的心愿弃学从政,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著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回忆录》等。

《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蒋廷黻应陈之迈邀请,为因战争流离失所而对知识渴求并对国家前途关心的民众和青年撰写。全书虽然才5万多字,但正如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所言:“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

蒋廷黻从以史为鉴出发,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在书中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

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全书共分四章,梳理了四种救国救民方案。第一章讲外患;第二章讲内忧。这是后面救国救民方案产生的背景,说明不学习西方,不进行变革,中国就没有前途了;第三章讲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这也是第一种方案;第四章讲了三种方案,即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谋篇布局,形成第一、二章为因,第三、四章为果的因果关系,显得叙事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确,“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作出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沈渭滨语),比较好读易懂,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和蒋廷黻的史学思想,本书收录了四篇蒋廷黻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文章,即“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本书以1939年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校订。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原著,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仅纠正明显讹误,未对民国时期文字语法做任何改动。原书中的观点、提法,一仍照旧,以让读者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观点和认识研究历史及时局的水平。诚如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为岳麓书社版所写的“重印前言”中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文存史”,“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个别地方参考了岳麓书社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谨致谢意。

目 录

中国近代史

| | |
|--------------|----|
| 总论 | 3 |
|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 9 |
|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 9 |
|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 14 |
| 三 东西对打 | 17 |
|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 21 |
|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 24 |
| 六 剿夷派又抬头 | 26 |
| 七 剿夷派崩溃 | 30 |
|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 37 |
|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 37 |
|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 41 |

2 中国近代史新编

| | |
|--------------|-----|
|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 45 |
| 四 洪秀全失败 | 48 |
|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 53 |
|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 53 |
| 二 步步向前进 | 57 |
| 三 前进遇着阻碍 | 60 |
|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 66 |
| 五 中日初次决战 | 75 |
|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 87 |
|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 87 |
|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 91 |
|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 95 |
|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 99 |
|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 105 |
|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 110 |
|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 113 |

中国与近代世界

| | |
|-----------------|-----|
| 第一篇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 119 |
|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 120 |
| 二 欧洲人的蚕食 | 122 |
|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 126 |

| | |
|----------------|-----|
|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 132 |
| 五 康熙帝的外交 | 137 |
| 六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 139 |
| 七 马戛尔尼来华 | 144 |
| 八 英国输入鸦片 | 150 |
| 九 鸦片战争前后 | 155 |
| 十 “抚夷”的难题 | 159 |
|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 162 |
|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 165 |
|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 166 |
| 十四 尾言 | 167 |
| 第二篇 琦善与鸦片战争 | 169 |
| 一 引言 | 169 |
|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 173 |
| 三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 184 |
| 第三篇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 195 |
| 小引 | 195 |
|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 196 |
|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 202 |
| 三、尼布楚交涉 | 214 |
|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 226 |
|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 234 |
|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 247 |

| | |
|-------------------|-----|
| 第四篇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 263 |
| 一 小序 | 263 |
|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 265 |
|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 271 |
| 四 南京的机会 | 279 |
| 五 热河失守以后 | 283 |
|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 289 |
|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 296 |
|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 301 |
|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 304 |
|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 309 |
| 十一 论“日本和平” | 315 |
| 十二 经过“满洲国” | 322 |
|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 329 |
| 十四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 332 |

中国近代史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

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 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

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

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